

林巴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的影响和价值

林教授把很多贴了青铜器照片的纸质卡片排列在那张桌子上，不断地改变它们的排列

松丸道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发言由广濑薰雄代读）：这次收到了林巴奈夫先生的巨著《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一卷中译本新书座谈会的邀请，却不能参加，我对此遗憾不已，觉得哪怕只说几句也好，至少应该表示祝贺和感谢之意。

关于我和林先生的交往与我在林先生撰写《综览》这部书的过程中做过的事情，我已经在这次出版的中译本序文中写过了，今天就不讲了。关于林先生学问的特征，我有一点一直在考虑的想法，想借此机会跟大家讲一下。

众所周知，林先生是所谓考古学者（依我看，更准确地说，他是现代考古学为基础的古器物学者），但他的眼光惊人地广阔，古文字学（尤其甲骨、金文之学）就不用说了，他还充分了解古典学和清代考据学的成果。我觉得，我们这一辈的考古学者中，对这些方面也十分了解的学者，在日本一个也没有。不仅在日本，这样的学者在中国也不多。

今天介绍一段往事。1974年，我们二人加上樋口隆康先生一共三人，为调查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商周青铜器，在台北待了40几天。有一天放假，林先生和我在闹市逛街，见到有一家书店堆着《皇清经

日本学者林巴奈夫(1925—2006)的著作《殷周青铜器综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今年5月出版了第一卷中译本(广濑薰雄、近藤晴香翻译,郭永秉润文)。

林巴奈夫先生是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学士院会员、著名考古学家。《综览》是上世纪80年代写作出版的一部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巨著,充分体现日本学者资料齐备、研究细腻的风格。

为了缅怀林巴奈夫先生在中国考古学尤其是古代青铜器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联合上海古籍出版社,于9月15日举办“林巴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一卷中译本新书座谈会”。

裘锡圭教授在致辞中谈道:“朱凤瀚先生在《中国青铜器综论》中对《综览》有详细的介绍,他认为这部著作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青铜器的著作中,最全面系统、最深入的一部,并指出其中许多有价值的、独到的见解。由于语言的隔阂,过去中国学界鲜有像朱先生这样,充分用到《综览》的成果,往往只利用了图版部分。现在广濑老师把这本书翻译出来,是值得庆贺的事情。他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尽可能使译本适合中国读者的需要,一定能使这部书在青铜器研究领域起到更大的作用。”

座谈会上,中日学者共聚一堂,评价林先生的著作,回顾与他交往的点滴,梳理和展望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历史和前景。本刊摘编部分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解》的覆刻本。这个覆刻本在日本没有见过,价格又非常便宜。发现这套《皇清经解》覆刻本的林先生高兴得不得了,立刻说要买下。那一瞬间,我心里很惊讶。我也大致了解清代考据学者的学术成果,但还是没有想到林先生为了古器物研究,要把搜集资料的范围扩大到这个地步。这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我还记得,那天我也帮他搬了一大堆书回宿舍。

不能出席这次座谈会,真的非常遗憾。自从去年夏天患狭心症动了手术,出国旅游对我来说已经有点困难了。为这次盛会奉上小文,是为了感谢大家对我的挚友林巴奈夫的帮助,尤其向裘锡圭先生、致力于《综览》翻译的广濑薰雄先生,以及跟他共同完成翻译的郭永秉先生,也表示无上的谢意,并且表达我不能参加座谈会的歉意。我相信,《殷周青铜器综览》中译本的出版一定会对中国商周青铜器研究的

发展有所贡献的。

小南一郎（泉屋博古馆馆长）：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有一个规定，评上教授的研究人员一定要组织一个共同研究班，发表其研究成果，例如在研究所的纪要上发表文章，编写报告书等。每个研究班设定具体的研究题目，参加的研究人员有十个人左右，每周或两周一次开会。每个班员根据自己负责的研究题目轮流作报告，然后大家对这个报告进行讨论。三年或五年后，汇集研究班的讨论成果，出版报告论文集。

林巴奈夫教授自从评上教授以后，也组织了好几个研究班。他的第一个研究班叫做“汉代的文物”研究班，这个研究班以汉代画像石为主要资料，讨论了汉代的文化和文化特征。他编的《汉代的文物》是这个研究班的研究成果。这部书把文献中所见的词汇和汉代画像中出现的東西相对照。对这些词汇和物品作解释，在当时可以

说是汉代名物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此后，林教授组织了“战国时代文物的研究”等好几个研究班，他在退休之前组织的最后一个研究班是“古史新证”，这个名字取自王国维的一部著作。

林教授组织的研究班，除了各个班员根据自己负责的研究题目作报告以外，还共同研读文献等各种资料。例如“汉代的文物”研究班，除了讨论沂南等各地画像石的内容以外，也用王先谦疏证补本研读刘熙的《释名》，此外还一起研读了当时新公开的“睡虎地秦简”。林教授的研究班不仅讨论新发现的考古遗物，还关注文献和古文字资料。例如以先秦文物研究为主题的几个研究班里，我们一直研读《周礼郑注》。林教授的研究班关注的范围不限于考古方面，而以整个文化史为对象。因此，参加研究班的人员里，考古学者倒不是很多，而有不少历史学者、科技史的专家、文献学者、语言学者等，可以说

是人才济济。

其实，林教授在评上教授以前组织过一个叫“金文辨伪”的非公开研究班。当时有一些学者对青铜器铭文的可靠性提出了怀疑，有人认为毛公鼎的铭文是伪造的，也有人认为散氏盘铭文的字体很可疑，甚至有人说大盂鼎的铭文也有可疑之处。这种意见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林教授的这个研究班的主要目的是考虑如何对待这种怀疑论。

这个研究班里有贝塚茂树、伊藤道治、松丸道雄等历史学者。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究竟有多少青铜器铭文可以作为历史资料来利用。我们把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作为材料，对《大系》所收的所有青铜器一一判断真伪。青铜器本身和铭文都没有问题的，我们标A，器本身和铭文都可疑的，标E，在这两者中间设定了几个等级。判断真伪的主要标准是每个字的写法。如果同一篇铭文里的同一个字的字体不同，或用不同的写法写，我们判断这个铭文是可疑的。

“金文辨伪”研究班继续了三四年，产生了各种研究成果。例如，在同一件青铜器的器上和盖上都刻有铭文的情况，盖铭和器铭的字的写法常常不同。因此我们知道，同一件青铜器上的两篇铭文可能是分别由不同的人写的。这个问题涉及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铭文的文字是铸造青铜器的工人写的，还是订货的贵族们（或者他们属下的书手）写的？虽说有这些发现，但关于辨伪问题

（下转4版）➔

◀（上接2版）

山谷，溪水沿谷底而流。左上方，有一亭式建筑倚立于左三山的山坳之前。右山脚下的溪水边，停泊着一小木舟，景象异常恬静。第三个空间，则是第二个空间左三山向左的延续，在画面最左面的山坳间，亦有两座茅屋隐现。有的茅屋顶上挑着一面小旗，是为酒肆的标志。从整个画面看，近景是峰峦迭嶂，远景则是山势连绵。树木、溪流、小桥、木舟、茅屋、酒肆等点缀其间。”“就卤簿钟饰纹带所表现的山水题材来说，也具有北宋绘画中山

水长卷的时代特征。”

中秋节前，曾两番进“宫”近距离观看《千里江山图》；不意在此又与北宋卤簿钟上的“千里江山图”相遇，一先一后同为政和年间物，而俱与徽宗及蔡京相关，脑海里影像的叠加几乎不可避免。卤簿钟上的山水图，大到重岗叠嶂联络映带的整体布局，小到曲涧幽溪的景物点缀，诸如溪桥、泊舟、亭阁、茅舍、劳人，更有山势及山峰肌理的表现手法，虽然一为绘制，一为铸造，精粗有异，繁简有别，但二者的相似，实在一目了然，甚或要说后者是前者的简易版，乃至前者竟是

粉本亦未可知。看展厅墙壁上，卤簿钟的拓本照片，便更可会得山水长卷的意味，且以它的循环往复而颇有江山无尽的效果。铜钟皇家制作的性质，是没有疑义的。《卤簿钟的年代研究》中说道，“若按卤簿钟饰纹中所表现的中心，皇宫大内的宣德门，当是作为北宋王朝的象征。而宣德楼又在政和八年改建，因此可以设想卤簿钟是为了在改建后的宣德楼上悬挂，作为北宋王朝的朝钟而铸造的”。如果这一推论可以成立，那么它与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正可相互发明。王希孟《千里江山

图》是宋代青绿山水之唯一，卤簿钟上如此气势的“千里江山图”也是铜钟纹饰之唯一，两件不同材质的作品，却有诸多偶然的关连——徽宗与蔡京，政和三年（《千里江山图》隔水黄绫蔡京题识起首即云“政和三年闰四月八日赐”）与政和八年，相关的人物以及耐人寻味的的时间节点，似可构成前后相衔的两段历史叙事而成为画作与铜钟共同的背景，共同的政治寓意或也隐然在其中。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策划：

文汇报理部

执行编辑：

任思蕴 rsy@whb.cn

封面图片：

肖西周 泉屋博古馆图版

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关注文匯學人

